

《诗经》在朝鲜传播的形态、方法与意义：以朝鲜汉诗对《诗经》的引用为中心

The Forms, Method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Book of Songs* in Korea: Focusing on the Citations in Korean Sinitic Poetry

刘茹楠 (Liu Runan)

内容摘要：《诗经》在朝鲜半岛的传播，本质上是东亚汉文化圈形成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跨文化接受案例。其流传并非单一维度的文本迁移，而是经由官方的制度化安排、教育的学术化推进与翻译的本土化实践等多重路径展开，最终内化为朝鲜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诗经》深刻浸润了朝鲜的汉诗、时调、歌辞及小说等诸体。朝鲜诗人广泛援引《诗经》的词语、诗句、篇名与意象，将这部古典的深厚旨趣融入自身创作，既拓展了朝鲜汉诗的语言表现力与思想内涵，又承继“诗言志”的传统与“赋比兴”的艺术法则，推动朝鲜汉诗的繁荣，促进儒家文化在朝鲜的延续，并使《诗经》成为联结中朝两国文化的重要纽带。

关键词：朝鲜汉诗；《诗经》；《箕雅》；传播

作者简介：刘茹楠，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本文为 2024 年度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一般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叙事方式研究”【项目批号：24JDSZK132】和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论述研究”【项目批号：GD22YXY04】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Forms, Method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Book of Songs* in Korea: Focusing on the Citations in Korean Sinitic Poetry

Abstract: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Book of Song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is, in essence, one of the most quintessential instances of the transcultural acceptance of a canonical text dur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East Asian Sinosphere. It was not merely transmitted by a one-dimensional text; but also through various forms and methods such as official institutionalization, educational academization and localized translation. And it has ultimately been internalized as an integral part of Korean national culture. *The Book of Songs* has profoundly permeated various literary

genres in Korea, including Sinitic poetry, *sijo* (Korean lyric poetry), *gasa* (narrative verse) and novels. By quoting its phrases, lines and titles and imagery, Korean poets have not only enriched the linguistic and semantic connotation of their works but also inherited the tradition of “poetry expresses aspirations” (*shi yan zhi*) and the artistic modes of “narrative, analogy, and association” (*fu bi xing*). This practice has promoted the flourishing of Sinitic poetry and facilitated the transmission and localization of Confucian culture in Korea. Consequently, *The Book of Songs* served as a vital bridge connecting Chinese and Korean cultures.

Keywords: Korean Sinitic poetry; *The Book of Songs*; *Ji Ya*; dissemination

Author: Liu Runan,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Marxism,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China 510420), specialize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Email: 201110055@gdufs.edu.cn).

《诗经》在朝鲜半岛的传播，本质上是东亚汉文化圈形成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跨文化接受案例。相较于一般意义上的文本流传，其特殊之处在于经历了从“经学文本”到“文学资源”的双重接受路径：一方面，自新罗王朝于公元 765 年规定《毛诗》为官吏必读书之一，高丽王朝确定《诗经》为士人科举考试科目，至朝鲜王朝性理学一尊地位的确立，《诗经》始终作为儒家意识形态的奠基性经典，在官方教育、科举考试与经学阐释体系中占据核心位置¹；另一方面，朝鲜诗人的汉诗创作大量引用中国经书，以经书语入诗，据赵季统计，在朝鲜规模最大的汉诗总集《箕雅》所收 2253 首诗歌中，直接引用《诗经》者达 147 处，引《尚书》97 处、《周易》37 处、《周礼》22 处、《仪礼》3 处、《礼记》36 处、《春秋左传》59 处（赵季 131），《诗经》被引用数量居首位，可见朝鲜诗人对其接受程度之深。²值得注意的是，朝鲜对《诗经》的接受并非单向度的影响模式，而是呈现出从选择性吸收到创造性转化的能动过程，深刻地影响了朝鲜的文学与文化。目前国内外讨论《诗经》在朝鲜半岛传播的论著整体上数量不多³，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从接受史角度进行宏观的考察⁴，从具体个案角度进行微观研究还有较大空间。本文通过梳理朝鲜汉诗对《诗经》的词语的引用、诗句化用、篇名与意象的征引，分析朝鲜汉诗语言表现力、思想内涵等方面对《诗经》的接受，以及对中国诗歌“诗言志”的抒情传统与“赋比兴”的艺术手法继承，试图探讨《诗经》促进儒家文化在朝鲜的传播和成为连接中朝两国文化的重要桥梁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1 参见 夏传才：“略述国外《诗经》研究的发展”，《河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1997）：70；李岩：“朝鲜古代《诗经》接受史考论”，《文学评论》5（2015）：127-129。

2 参见 赵季：“《箕雅》引经考”，《文学遗产》4（2009）：131。

3 参见 付星星：《朝鲜时代〈诗经〉学史》，北京：中华书局，2023 年，第 11-12 页。

4 参见 李岩：“朝鲜古代《诗经》接受史考论”，《文学评论》5（2015）：127。

一、《诗经》在朝鲜的传播形态与方法

《诗经》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和儒家核心经典之一，其传入朝鲜半岛的历史源远流长，并对朝鲜的政治、教育、文化及文学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其传播并非单一维度的文本传递，而是通过官方制度化、教育学术化、翻译本土化等多种形态与方法，逐步渗透到朝鲜社会的各个层面，最终内化为朝鲜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早期传入与官方制度化传播

《诗经》传入朝鲜半岛的时间，普遍认为不晚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¹ 尽管确切的传入路径和时间点尚无定论，但一些间接证据表明其影响在三国时代已现端倪。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早期例证是高句丽第二代君主琉璃明王类利于公元前17年所作的《黄鸟歌》。该诗“翩翩黄鸟，雌雄相依。念我之独，谁其与归？”（金富轼177）的句式与意境，明显受到《诗经·周南·关雎》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影响（阮元269），显示出《诗经》的意象与表现手法已在朝鲜半岛的文学创作中留下了印记。进入公元4世纪后，《诗经》的传播开始与官方教育体系相结合。据《三国史记》记载，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372年），国家设立了中央官学“太学”（金富轼221），其教授内容明确包括“五经”与“三史”。² 作为“五经”之一的《诗经》，无疑成为贵族子弟系统学习的核心经典。这标志着《诗经》在朝鲜的传播从零星的文化渗透，转变为有组织的、制度化的官方教育行为。与此同时，百济王朝也积极引入《诗经》等儒家经典。据《南史》记载，梁武帝天监十年（511年），百济曾遣使请求梁朝派遣讲授《毛诗》的博士，梁武帝遂派学者陆诒前往。³ 新罗王朝同样重视《诗经》的教育功能，于公元765年明确规定《毛诗》为各级官吏的必读书目之一，将其与治国理政的实践能力直接挂钩。通过这些官方教育制度的建立，《诗经》在三国时期得以在朝鲜半岛的精英阶层中广泛传播，为其后续更深层次的文化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高丽王朝科举制度的引入与完善，成为推动《诗经》在全社会范围内普及的最重要动力。光宗九年（958年），高丽王朝效仿中国唐朝的制度，正式设立科举考试。在考试科目中，“明经科”是核心内容之一，而《毛诗》则被定为该科的主要考试经典之一。这一制度性安排，使得《诗经》的学习不再仅仅是贵族或少数知识精英的特权，而是成为所有渴望通过科举入仕的士子们必须精通的“敲门砖”。朝鲜王朝经筵制度的完善与帝王的身体力行，使

1 参见李岩：“朝鲜古代《诗经》接受史考论”，《文学评论》5（2015）：127-129。李岩文中认为“《三国史记》，高句丽于372年设立太学，主要以中国的四书五经教育子弟。”“高句丽372年”相当于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东晋时期317-420年。

2 参见杨雨蕾、魏志江、蔡健：《韩国的历史与文化》，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7页。

3 参见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16页。

《诗经》的传播与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状态。通过经筵，帝王不仅自身深化了对《诗经》的研习，更以其至高无上的权威，向全国臣民昭示了《诗经》在国家政治与文化生活中的核心地位，起到了强大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二）教育与学术层面的传播

在朝鲜王朝长达五百余年的统治期间，教育体系的构建始终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而《诗经》作为儒家“五经”之一，是官学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核心教材。从高丽王朝延续下来的科举制度，在朝鲜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诗经》始终是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这意味着，每一个希望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士人，都必须从幼年时期开始，对《诗经》进行系统、反复的学习和背诵。这种制度化的教育安排，使得《诗经》的知识在朝鲜的知识阶层中得到了最广泛的普及。无论是中央的最高学府成均馆，还是遍布全国各地的乡校和书院，《诗经》都是基本课程之一。随着《诗经》在朝鲜的广泛传播和深入人心，一代代的朝鲜学者开始不满足于仅仅接受和复述中国的注疏，而是尝试从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出发，结合朝鲜自身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独立的思考和阐释，从而产生了大量具有朝鲜特色的《诗经》研究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形式多样，涵盖了注释、考据、评论、札记等多种体裁，构成了一个蔚为壮观的朝鲜《诗经》学体系。据相关研究统计，仅朝鲜时代的《诗经》学著作就有七十余种¹，这些著作勾勒出了朝鲜《诗经》学的独特面貌。

（三）翻译与本土化传播

《诗经》在朝鲜的传播并不仅仅局限于使用汉字的精英阶层。为了让这部儒家经典能够被更广泛的社会群体所理解和接受，朝鲜学者和文人们还致力于将其翻译成朝鲜本民族的语言“谚文”，并使其融入到日常生活的伦理教化之中。这一翻译与本土化的过程标志着《诗经》从一部中国的“他者”经典转变为朝鲜本土文化血脉的一部分。朝鲜王朝中期，随着谚文的创制和普及，真正意义上的《诗经》翻译开始出现。其中，最具完整形态的《诗经》译本，是宣祖时期着手完成的《诗经谚解》。这部著作的出现是《诗经》在朝鲜本土化传播的一个里程碑。它系统地用谚文对《诗经》的原文进行了翻译和注释，使得那些没有受过系统汉文教育的读者，也能够直接阅读和理解《诗经》的内容。这不仅拓展了《诗经》的受众范围，也促进了儒家思想在民间的普及。

二、《诗经》在朝鲜汉诗中的体现

《诗经》自公元4世纪前后传入朝鲜半岛以来，对朝鲜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成为塑造朝鲜文学精神与形式的典范。它深刻地渗透到朝鲜的各种文体之中，从高雅的汉诗，到时调、歌辞等朝鲜特有的民族诗

1 参见付星星：《朝鲜时代〈诗经〉学史》，北京：中华书局，2023年，第21页。

歌形式，乃至通俗小说，无不留下了《诗经》的烙印。《诗经》对朝鲜各体文学的影响，在汉诗创作中体现得最为显著。朝鲜性理学大师、著名汉诗诗人李珣所说：“《三百篇》，曲尽人情，旁通物理，优柔忠厚，要归于正，此诗之本源也”（269）。《诗经》既是朝鲜汉诗创作的源头活水，也是朝鲜文人精神世界的重要支柱。朝鲜诗人通过引用《诗经》的词语、诗句、篇名和意象，将这部古老经典的深厚意蕴融入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

（一）词语的引用

朝鲜诗人善于从《诗经》中选取那些具有独特表现力的词汇，来精准、生动地描绘景物或抒发情感，从而使自己的诗歌语言更加精炼和传神。如郑摠《春雨》“霖霖知时节，廉纤逐晓风”（南龙翼 420）中“霖霖”出自《小雅·信南山》“益之以霖霖，既优既渥”。关于“霖霖”的含义，《毛传》说“小雨曰霖霖”，《郑笺》进一步解释为“成王之时，阴阳和，风雨时，冬有积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润泽则饶洽”（阮元 470），把二者结合起来，“霖霖”可以理解为有益于润泽万物的春天的小雨，表达诗人对适时到来春雨的喜爱和赞美。金时习《杂吟》“硕大固无匹，塞渊端寡偶”（南龙翼 1183）中“硕大”“塞渊”分别出自《陈风·泽陂》“有美一人，硕大且卷”（阮元 379）和《邶风·燕燕》“仲氏任只，其心塞渊”（阮元 298）。“硕大”形容客人身材壮硕，“塞渊”形容客人笃厚诚实，见识深远，表达诗人对客人高度赞赏。

（二）诗句的化用

朝鲜汉诗对《诗经》诗句的运用包括直接引用成句入诗和化用诗句入诗两种情况，但以化用诗句入诗为主。直接引用成句的如金时习《夜如何》“夜如何其夜未央，繁星灿烂生光芒”（南龙翼 1322），其中“夜如何其夜未央”语出《小雅·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阮元 432）。“夜未央”是指夜晚未尽天未亮之时，表明诗人内心苦闷之情。化用诗句入诗情况较多，如李鼐《放言》“风雨鸣不已”语出《郑风·风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阮元 345），寓意不公平社会中不乏有识之士。朴闇七言古诗《题蚕头录后》“江水初生方涣涣”（南龙翼 1335）语出《郑风·溱洧》“溱与洧，方涣涣兮”（阮元 346），形容江水奔腾不息的景象。权伋《白沙宅应呼咏三色桃》“夭桃灼灼映踈篱”（南龙翼 350）语出《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阮元 279），称赞三色桃的花朵怒放，明亮鲜艳的样子。李奎报《送金先辈登第还乡》“春同莺出谷”（南龙翼 388）语出《小雅·伐木》“伐木丁丁，鸟鸣嚶嚶。出于幽谷，迁于乔木”（阮元 410），寓意人往高处走，事业不断进步。

（三）篇名的引用

朝鲜诗人常常通过引用《诗经》的篇名，来直接点明或暗示自己诗歌的主旨，使得诗歌的立意更为清晰和深刻。如李晔光《宫词》“入夜银床露压烟，漏声初下紫微天。君王此际忧民切，案上时看七月篇”（南龙翼 296），其中的“七月篇”是指《诗经·豳风·七月》，关于《七月》的主旨，《毛诗序》认为是“陈

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阮元 388），方玉润《诗经原始》认为“《豳》仅《七月》一篇所言皆农桑稼穡之事”（方玉润 270）。由此看来，诗人李晔光引用“七月”是来表现君王对百姓农耕生活的关心。金鑒《题东阳尉上林图》“独怜上苑犹秦地，谁继襄公赋小戎”（南龙翼 980），诗中的“小戎”是诗的名称，是指《诗经·秦风》中的诗篇《小戎》。关于这首诗的主旨，《毛诗序》说：“《小戎》，美襄公也”（阮元 369），诗人引此表达对东阳尉申翊圣赞赏之情。除了点明主旨，引用篇名还能有效地引发读者的联想，将诗歌的意境拓展到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中。如任鐏《赠姜睡隐》“皎皎在空谷，白驹歌正悲”（南龙翼 544），语出《小雅·白驹》“皎皎白驹，在彼空谷”（阮元 434），该诗化用了诗句，又引篇名入诗。“皎皎在空谷”无疑分别摘取《白驹》上半句中的“皎皎”和下半句中“空谷”重新组合而成。同时该诗引《白驹》篇名入诗，也有表达诗歌主旨之意。关于该诗的主旨，《毛诗序》说“《白驹》，大夫刺宣王也”（阮元 434），《毛传》进一步阐发说“刺其不能留贤也”（阮元 434），诗中任鐏既表达了对姜沆才志难伸的个人慨叹，亦是对《白驹》挽留贤者、叹惋遗才这一传统诗旨的承续。

（四）意象的引用

朝鲜汉诗引用《诗经》意象类型多样。有勤政爱民的官员意象，如“甘棠”象征体恤百姓疾苦、仁民爱物、深受百姓爱戴的官员，语出《召南·甘棠》“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阮元 287）。再如，黄廷彧《送崔复初自洪阳再按海西》“甘棠旧翠还新色，宝带黄金换素银”（南龙翼 873）引“甘棠”意象表达对即将到海西赴任的好友崔复初勤政爱民为官品质的赞扬。又如，“皇华”象征劳于王事、为国事奔走、尽心尽职的使臣形象，典出《小雅·皇皇者华》序。《毛诗序》对此解释说：“《皇皇者华》，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礼乐，言远而有光华也”（阮元 407）。朴寅亮《使宋过泗州龟山寺》“一奉皇华堪惜别，更留诗句约重攀”（南龙翼 611）引“皇华”表明自己奉王命出使宋朝。有引用离别思念意象，如借“柳”意象表达离别之情，事本《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阮元 414），曹文秀《遣愁》“陌头杨柳正依依，远客登楼恨未归”（南龙翼 1017），崔致远《题海门兰若柳》“只恐观音菩萨借，临行不敢折纤枝”（崔致远 507）都是借柳意象反映送别之情的诗句。有引用兄弟情谊意象，如《小雅·常棣之华》“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阮元 408），《毛诗序》云“《常棣》，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阮元 407）。该诗写兄弟宴饮之乐，歌唱兄弟亲情。因此该诗中“常棣”“棣萼”“棣花”“脊令”都常被借用以象征兄弟情谊。金尚宪《梦到清风溪次韵》“华屋沉沉更未归，棣花零落鹧鸪飞”（南龙翼 316-317），也是借用这些意象表达兄弟友爱、手足情深这一恒久主题和人类普遍情感。

朝鲜汉诗对《诗经》意象的引用，既体现出对中华诗学传统的自觉继承，又

在情感基调与社会功能上发生了若干适应本土语境的微妙转变。首先,这体现在核心情感与道德功用保持一致方面。在情感上,无论是《诗经》中“甘棠”所寄托的民众对召伯的感念,还是“常棣”吟咏的手足亲情,其温暖、诚挚的内核均被朝鲜汉诗完整接纳,成为表达赞美、离别、友爱等普遍人类情感的文化符号。在社会功能上,二者均承担着道德教化的角色。《诗经》对勤政、忠诚、人伦的颂扬,被朝鲜士大夫引为典范,用以标榜儒家的为官之道与处世准则,如以“甘棠”勉励官员仁政,以“皇华”申明使臣之责,这延续了诗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的社会伦理功能(阮元 269)。其次,朝鲜汉诗对《诗经》意象的运用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在情感基调上,《诗经》中的意象往往植根于中原先秦的特定历史与现实土壤,带有更强的原初叙事性与集体情感色彩;而朝鲜汉诗中的引用,则多融入诗人个体的宦游、赠别、怀人之中,情感更趋个人化与文人化,如“陌头杨柳”抒发的已是诗人自身的羁旅之愁。在社会功能上,《诗经》作为儒家经典,其意象本身具有神圣的礼乐规范意义;而在朝鲜汉诗中,这些意象除延续道德劝谕外,更凸显了其文化认同与身份建构的维度。通过娴熟化用《诗经》典故,朝鲜诗人彰显其作为中华文化圈士人的学养与身份,使诗歌成为维系两国文化血脉、抒写本国士人情怀的典雅媒介。因此,这种引用不仅是对经典意义的传承,更是一种主动的、具有文化对话性质的创造性运用。

三、《诗经》在朝鲜传播的文学与文化意义

《诗经》在朝鲜的传播深刻介入了朝鲜的文学创作、文化建构乃至社会政治生活,其意义是多层次的。从文学层面看,它影响了朝鲜汉诗的创作范式,为其提供了丰富的语言资源、艺术手法和思想内涵。从文化层面看,它作为儒家文化的核心载体,有力地促进了儒家思想在朝鲜的传承,并成为维系东亚汉文化圈的重要纽带。

(一) 对朝鲜汉诗创作的影响

《诗经》对朝鲜汉诗创作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它不仅为朝鲜诗人提供了创作的典范和灵感的源泉,更在诗学观念和艺术手法等层面,塑造了朝鲜汉诗的独特品格。朝鲜汉诗之所以能够达到较高的艺术成就,与对《诗经》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密不可分。

朝鲜汉诗继承了中国“诗言志”的文艺传统。朝鲜文人学习和吸收“诗言志”的文学观念,强调“性情之真”与“性情之正”。其中,明确主张“诗言志”的如柳梦寅《於野谈》中说:“诗者言志。虽辞语造其工,而苟失意义所归,则知诗者不取也”(蔡美花 赵季 1029);朝鲜王朝末期安肯来《东诗丛话》“虞舜教夔,曰‘诗言志’。何今之人,多辞寡意?意似主人,辞如奴婢。主弱奴强,呼之不至。穿贯无绳,散钱委地。开千枝花,一本所系”(蔡美花 赵季 902-904)。以上二人在主张“诗言志”的同时,均强调“志”“辞”“意”

之间的密切关联。

“赋比兴”是《诗经》开创的三种基本艺术表现手法。朝鲜汉诗在学习和借鉴《诗经》的过程中，也充分吸收了这三种手法，并将其灵活运用于创作实践，丰富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朝鲜诗人用“赋”的手法直接抒发情感，叙述事物，描写人物、景物，如崔致远《江南女》“江南荡风俗，养女娇且怜。性冶耻针线，妆成调管弦。所学非雅音，多被春心牵。自谓芳华色，长占艳阳年。却笑邻家女，终朝弄机杼。机杼纵劳身，罗衣不到汝”（崔致远 515）。该诗作于江苏溧水县尉任上，当时崔致远经常接触百姓，了解民情。诗中用铺叙的手法描写了一个江南上层社会的女子形象。首先用“娇且怜”概括出贵族女子的娇生惯养、引人爱怜的总体形象，接着用“耻针线”“妆成”“调管弦”描写女子每天的生活内容，用“荡”“娇”“怜”“冶”和“非雅音”“春心牵”塑造出一个爱慕浮华、不愿劳作、空虚放荡的女子形象。朝鲜诗人对“兴”的手法运用也非常娴熟。如高丽朝偈《拟戍妇捣衣词》：“皎皎天上月，照此秋夜长。悲风西北来，蟋蟀鸣我床。君子远行役，贱妾守空房。空房不足恨，感子寒无裳”（南龙翼 1162）。该诗以前四句起兴，表现在家独守空房妻子思念在外服役丈夫的哀愁。

（二）作为中朝文化交流的桥梁

《诗经》作为儒家“五经”之一，其在朝鲜的传播本质上是儒家文化在朝鲜半岛传播与扎根的一个缩影。朝鲜文人通过对《诗经》的学习、研究和实践，促使儒家文化在朝鲜得到了系统性的传承，成为塑造朝鲜民族精神和文化认同的核心力量。《诗经》中蕴含着丰富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如忠、孝、节、义、礼、智、信等，这些观念通过《诗经》在朝鲜的传播，得以在朝鲜社会中广泛普及和强化。同时，《诗经》作为儒家文化的核心经典，其在朝鲜半岛的深入传播，同时也是汉文化圈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标志。汉文化圈，或称儒家文化圈，是指历史上受中国政治、文化深刻影响的东亚和东南亚部分地区，其共同特征是以汉字为书写工具，以儒家思想为文化内核。朝鲜作为汉文化圈的重要成员，其对《诗经》的接受和尊崇，是其融入这一文化圈的关键一步。从三国时期设立太学，到高丽王朝实行科举，再到李朝时期将朱熹《诗集传》奉为圭臬，朝鲜在制度层面全面接纳了以《诗经》为代表的中国经典教育体系。这种制度化的接纳，使得朝鲜的精英阶层在知识结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上，与中国士人高度趋同。他们共同诵读《诗经》，共同尊崇孔子，共同以儒家伦理为行为准则。这种文化上的同质性，构成了中朝两国长期保持密切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的基础。《诗经》不仅是朝鲜学者研究的文本，也是他们与中国文人进行深度对话的媒介。在朝鲜使臣出使中国的过程中，赋诗唱和是一种常见的文化交流方式。朝鲜文人常常通过引用《诗经》中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与中国文人进行精神上的沟通。例如，晚清时期，朝鲜使臣与京师文人社团“龙喜社”的成员之间就有着频繁

的诗歌酬唱活动¹，这使得中国的典籍和思想，也能够迅速在朝鲜得到传播和响应。《诗经》在其中扮演了文化“通用语”的角色，成为两国文人沟通思想、交流情感的重要媒介。

《诗经》在朝鲜的广泛传播和深入人心，也为其进一步向其他域外地区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和辅助作用。朝鲜在接受《诗经》之后，并非将其束之高阁，而是积极地将其作为文化资本向周边国家，特别是日本进行再传播。早在南北朝时期，百济王朝就曾派遣学者王仁等人赴日本，为日本皇室和贵族讲授《论语》《千字文》等儒家经典。这一事件，是日本系统接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开端，而朝鲜在其中扮演了文化“二传手”的角色。此外，朝鲜诗人对《诗经》的频繁引用，本身也构成了一种独特的传播方式。这种通过文学创作进行的“活”的传播，使得《诗经》的文本内容和文化精神，能够超越单纯的经学著作，以更为生动、感性的形式，在东亚文化圈内流传。因此，可以说《诗经》在朝鲜的传播，不仅丰富了朝鲜自身的文化，也为这部中华经典走向世界，特别是向东亚地区的传播，开辟了一条重要的、充满活力的辅助渠道。

Works Cited

蔡美花、赵季编：《韩国诗话全编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

[Cai Meihua and Zhao Ji, eds.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and Annotation of Korean Poetry Talks*.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2.]

崔致远：《崔致远全集》，李时人、詹绪左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Choe, Chiwon. *The Complete Works of Choe Chiwon*, edited and emended by Li Shiren and Zhan Xuzuo.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8.]

方玉润：《诗经原始》，李先耕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

[Fang Yurun.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Book of Songs*, edited and annotated by Li Xiange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21.]

付星星：《朝鲜时代〈诗经〉学史》。北京：中华书局，2023年。

[Fu Xingxing. *A History of the Study of The Book of Songs in the Joseon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23.]

金富轼：《三国史记》，孙文范等校勘。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

[Kim, Pusik. *Samguk Sagi*, edited by Sun Wenfan, et al. Changchun: Jili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Publishing House, 2003.]

李波：“诗赋外交：晚清‘龙喜社’与朝鲜使臣交往考论”，《中国典籍与文化》6（2024），134-144。

[Li Bo. “Diplomacy Through Poetry and Prose: A Study o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Longxi

1 参见李波：“诗赋外交：晚清‘龙喜社’与朝鲜使臣交往考论”，《中国典籍与文化》6（2024），134-144。

Societ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Korean Envoys." *Chinese Classics & Culture* 6 (2024): 134-144.]

李珥：《栗谷全书》。首尔：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1971 年。

[Li Er. *Yulgok Jeonseo*. Seoul: Sungkyunkwan University Daedong Institute of Culture, 1971.]

李岩：“朝鲜古代《诗经》接受史考论”，《文学评论》5（2015）：127-138。

[Li Yan. "A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Reception of *The Book of Songs* in Ancient Korea." *Literary Review* 5 (2015): 127-129.]

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

[Li Yanshou. *The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5.]

南龙翼编：《箕雅校注》，赵季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

[Nam, Yong-ik, ed. *Annotation of Ji Ya*, annotated by Zhao J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8.]

阮元校刻：“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

[Ruan Yuan, Emendator. "Correct Meaning of Mao's Annotations on *The Book of Songs*." *The Thirteen Classics with Commentary and Subcommentar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0.]

夏传才：“略述国外《诗经》研究的发展”，《河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1997）：70-77。

[Xia Chuancai.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Research on *The Book of Songs*." *Journal of Hebei Normal College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 (1997): 70-77.]

杨雨蕾、魏志江、蔡健：《韩国的历史与文化》。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 年。

[Yang Yulei, Wei Zhijiang and Cai Jian. *Korean History and Culture*. Guangzhou: Sun Yat-sen UP, 2011.]

赵季：“《箕雅》引经考”，《文学遗产》4（2009）：131-136。

[Zhao Ji. "A Study on the Citation of Classics in 'Ji Ya'." *Literary Heritage* 4 (2009): 131-136.]